



● 河北省出版史志编辑部

河北出版 史志资料 选辑

(第四辑)

1989

河北出版史志资料选辑

(第四辑)

河北省出版史志编辑部



解放战争时期的《冀中导报》与新华社冀中分社编辑出版的通讯员刊物《通讯往来》。

由冀南新华书店编辑出版的《工农兵》杂志，于1946年4月创刊于威县方家营村。图为保存下来的部分刊物。



这是北方人民出版社后期出版物之一：《苏联革命过程中底农业问题》。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改用新光书店刊行。

15917



在抗日战争极端残酷、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创办了精美的大型摄影刊物《晋察冀画报》这是画报1944年第5期封面。

图二 晋察冀边区出版的书籍



这是晋察冀边区出版的书籍。

目 录

- 三十年代河北省党的秘密刊物……………李华生(1)
- “北方人民出版社”始末……………韩晓明(6)
- 忆北方人民出版社……………王禹夫(12)
- 王宗良与旭光社……………袁同兴(17)
- 直南革命书刊的编印与发行……………呼中汉(26)
- 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的193种报刊……………社 敬(42)
- 冀东《救国报》(滦西版)回忆片断……………周新华(93)
- 解放战争时期的《工农兵》杂志……………宋复光(105)
- 安国县报刊史料……………王景仁(113)
- 《晋察冀画报》生活琐记……………章长石 李遇寅(116)
- 邓拓要我们印好《毛泽东选集》……………沈 达 曹国辉(129)
- 诞生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选集》版本考之一……………汪裕尧(134)
- 关于铸版机试制成功的情况……………王书铭(145)
- 《导报》、《冀中导报》和冀中新华书店印刷厂……………贾呈祥(149)
- 冀南书店的回忆片断……………胡青坡(156)
- 回忆察哈尔省新华书店平西第一支店……………李兴荣 薛连山(159)
- 冀热辽新华书店筹建经过……………张晏如(161)

张家口市的私营书店在解放前后经营概况……………马凌光(163)

莫循与《冀南日报》……………马秋芸 李寿彭(171)

沙飞与《晋察冀画报》……………吴 群(178)

记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首任经理罗军的

牺牲……………路顺国 曹国辉(184)

河北古代几位著作家及其刻书……………雷梦水(187)

民间年画艺术的再发扬

——略谈武强年画……………张春峰(192)

敬告读者……………(198)

三十年代河北省党的秘密刊物

李 华 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东北，中日矛盾日趋尖锐，华北已成为抗日前线，整个华北形势已开始转入新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革命高潮也将随之蓬勃高涨起来。党中央为了适应北方发展起来的革命大好形势，集中力量抓好北方工作，于1932年6月下旬，在上海召开了党的北方会议。会上讨论研究了反对日寇侵略，拯救华北危亡，开展和发动抗日游击战争问题。会议确定：由于日寇侵略，加深了中日民族矛盾，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已成为当前国家极其重要的大事，为进一步把群众性的抗日反蒋斗争开展起来，必须加强党团对北方的领导，深入认真地抓好东北、华北、西北工作，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把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北方来，以迎接北方革命高潮，这是党中央重大的战略转变。

1933年5月，河北省党组织遭到破坏（此时只有团组织还在活动），一切联系中断，情况极为严重。1933年8月，我在团中央任秘书长，主持上海工作期间，党团中央为了解北方情况，派我以巡视员身份来北方巡视。其任务是：一、传达党中央“关于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决议”；二、为配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将领发起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事变，开展北方抗日运动；三、研究和考察可否在冀东长城沿线一带，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四、寻找党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下落。一旦找到后，要立即建立北方与上海的联系，并协助恢复河北省党委，加强平津工

作。1933年9月上旬(农历中秋节前后),我由上海抵达北平不久,即与河北省团委小郑(朝大学生,团省委组织部长,代理团省委书记)接上了关系。随后,通过省团委又与在天津的团中央驻北方特派员小朱(赵其惠)取得了联系,并在天津小白接与小朱见了面。当时,时局很紧张,他们(指孔原、饶漱石等人)已从北京到了天津,因孔原(亦名石心,党中央驻北方代表)同志与中央联系已断,正在着急。他转达孔原同志意见,(原文如此——编者)冯玉祥等在张家口发动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很失利,委我立即返回北平,代表党中央驻北方代表处理这个事件的善后事宜。1934年1月,我将“同盟军”问题料理完之后,专程回到天津汇报工作。汇报后,孔原同志要求我仍留在北方,负责这个地方的联系工作,并决定我代表团中央领导团省委工作。1934年春,党中央派朱理治来北方工作,为河北省委代理书记,孔原决定由我担负北方代表秘书长工作。

《北方通讯》与《实话报》

在我担任北方代表秘书长期间,根据孔原同志指示,加强与中央的联系。同时我还编印了一个刊物《北方通讯》,经常登载一些材料和文章,做为向中央报告的辅助补充材料。该通讯约编印了五、六期,每期都是由梁虹负责刻写,油印发出的。通讯刊载的形式和文章,大都是由我亲自撰写和编排的。办刊的目的是要象潘问友(潘东周,湖北人,系李立三的秘书长)办《北方红旗》那样,不仅能够向中央和领导提供情况,反映问题,而且刊物的形式和内容要办得新颖,生动活泼,内容更要丰富多彩,不仅登载我们的工作情况,经验,问题,还有介绍敌人和敌占区情况,揭露、抨击敌人的文章。那时,我还以“仲达”的笔名写了一篇《国民党统治下经济达到崩溃的境地》的文章,在《通讯》

刊登后，被陈尚友（陈伯达）发现，在未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拿到《长城》报上刊登了，后来《民主自卫战旗》也刊载过这篇文章。

1934年夏，我由秘书长改任宣传部长，接朱理治领导陈尚友工作。因为陈尚友1933年曾在张家口与李铁夫一起办过《老百姓报》。因他们办报有基础，省委决定，由我负责领导，陈尚友出面创办了《实话报》。该报系八开四版，刻写油印，不定期出刊的报纸。

《实话报》主要内容为：一、刊载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披露日寇在“天羽声明”（亦称四一七声明）发表前后，大唱所谓“协和外交”、“中日提携”，行经济侵略的真实目的；抨击中日签订的“塘沽协定”，指出该“协定”实质是中国人民丧权辱国的“协定”，是断送华北，使日寇肆意在中国国土上任意横行的祸根。二、揭露国民党投降卖国，不抵抗真相。三、介绍和报道天津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日、蒋、特等敌人进行斗争的情况。当时帝国主义老板和洋奴、买办们在天津作威作福，残酷剥削和压榨工人、广大工人饥寒交迫，生计毫无保障，挣扎在饥饿线上，暴尸街头的现象屡有发生。天津工人阶级（特别是四大纱厂——裕大、裕元、恒源、北洋和码头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广大劳苦群众，为生活为自由，向日寇、蒋介石卖国政府展开了殊死斗争。我们通过对上述生活现实的揭露和报道，进一步激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的民族恨、阶级仇，从而增强了同日寇、蒋特、汉奸、洋奴等斗争的信心。四、刊登当时北平各大学校及天津北洋、法商、南开等大学及一些中学开展反对日寇侵略华北、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的学生运动情况。

由于这个报纸的观点明确，立场鲜明，颇受天津广大工人学生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欢迎。

后来，因陈尚友犯了错误，被撤销了工作，《实话报》也就

停刊了。

冀南抗日刊物——《直南战斗》

1934年底，我被调动工作，以北方局巡视员身份，派到直南（宣，即直隶，今河北省）考察，发动游击战争。到直南以后，经过思想发动和组织发动，抗日反蒋游击战争，很快就在河北省邯郸一带发动起来。为了适应运动深入开展，北方局又将直南特委分开，分别成立冀鲁豫特委和冀南特委，我被任为冀南特委书记。我在冀南领导冀南人民开展抗日反蒋游击战争期间，为了宣传抗日救国，交流各地抗日经验，指导和推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深入发展，在我提议、亲自主持下，办了一个刊物——《直南战斗》。这个刊物的封面是我自己设计的，刊头的美术字是我跟章文晋学写的。这个刊物为三十二开油印本，是由王伯华同志负责刻写油印的。我为《直南战斗》写了五期文章，刊物大体登载国内外形势和我们开展游击战的消息、动态，工作经验交流等，具体为：一、揭露日寇武力侵占东北、进攻华北的阴谋，利用种种借口，寻机滋事，强迫中国与其签订不平等条约，强行通车、通邮，在长城各口建立税卡，大搞特务活动，指使汉奸（殷汝耕）搞反共的自治政府和密使白坚武武装占领平汉、平绥、京山铁路中心枢纽——丰台，等等。二、抨击国民党蒋介石投降卖国，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在日寇猖狂进攻面前，国民党频频南撤，国民党政客、土豪劣绅，四分五裂，惶惶不可终日，有的远走高飞，落荒而逃，有的投靠日寇、认贼为父。（当然，也有的人晓明大义，投奔共产党，共谋抗日大计，这部分人对冀南游击战争的迅速开展曾作出贡献。）三、宣传我党中央积极抵抗日寇的正义主张，指出我们在冀南发动抗日反蒋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讲清冀南是华北抗日的前进阵地，冀南游击战争是冀南人民

在天灾（旱灾、水灾）人祸（日寇进攻、国民党反共、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压榨），生活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发动起来的，它是武装的抗日运动、盐民运动、灾民难民的群众运动三大潮流的汇合。

《直南战斗》是我党在华北的一份刊物，它在当时对启发人民抗日，认清蒋介石卖国，激动人民拿起武器，抗击日寇，反对蒋介石卖国以及拯救国家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冀南游击战争失败，此刊亦于1936年初被迫停刊了。

“北方人民出版社”始末

韩 晓 明

我国在解放前曾有过只有几个人的小出版社，可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名城保定，更有过仅有一人担负一切工作的出版社，这就是王辛民（现名王禹夫，1929年入党，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问）同志负责的“北方人民出版社”。从编审、校对到发行、联络，都由他一人担任。这和1921—22年党在上海办的人民出版社由李鹤鸣（李达）一人负责一切社务的情况，大致相似。

30年代初，一方面北方白区的革命形势有些回升与活跃，一方面革命人民大众的精神食粮极感缺乏，而上海中央的出版物又不易来到北方，当时北平也缺乏印刷这些书刊的适当场所。在这种情况下，北平党组织，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尽快把党的出版物和马克思主义书籍送到广大革命群众手中，满足革命人民、特别是广大革命青年的需要，于1931年9月在保定建立了党的地下出版机构——北方人民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出版党的一些重要文献，重印已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编印一些有关指导当时革命实际行动或政策性的书刊。

如何实现这个出书计划呢？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完成出版、发行任务，谈何容易，哪个环节搞不好，随时都会发生意外，冒杀头的危险。中共保属特委之所以确定由王辛民负责出版社的工作，是因为他当时在保定担任革命互济会（党的援助斗争的外围革命群众组织）的开辟工作，组织上知道他和保定协生印书局的编审赵云韬熟悉（赵原是保定第六中学的进步教员，被反

动当局解聘后来到协生印书局，王辛民曾介绍他加入了革命互济会），这样王辛民又通过赵认识了该印书局的经理张培植（进步人士或称地下革命者），遂同赵、张协商出版革命书籍之事，他们慨然答应可以照办。经商定，每印出一本书随即交付一部分印费。于是开始试印《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元素表》（张伯简译制，原件是上海书店套色石印版，当时是重排铅印单色版），及瞿秋白著《社会科学概论》（封面改印为《社会科学研究初步》，署名布浪得尔著，杨霞青译，以蒙混敌人耳目）。从试印两种书结果看，是顺利的，是可以继续搞下去的。

“为了从长计议，对读者、对工作负责，需要确定出版社的名号。”王辛民同志考虑到以前党的出版机构，曾用过“人民出版社”（1921—22年，社址实在“上海”却印为“广州”，以迷惑敌人的视线）、“新青年社”（1920—27年）、“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均1923—27年）和“华兴书局”（1929—32年）等以前用过的名号，经过再三斟酌，还是以对读者有较大影响的“人民出版社”这个名号为好，所以出版物上都刊印着“人民出版社出版”（有的则在前面更加“北方”二字），“新生书社发行”的字样（在北方，当时读者对“新生社”、“新生读书社”较熟悉）。但后来，由于白色恐怖严重，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查禁、检扣，常常在书的封面、扉页或版权页上另印有别的名号，如“人民书店”、“北国书社”，或“新光书店”、“新生书社”等等。有时还要更换著译者姓名和书名，或者干脆把封面伪装为别的假封面。

当确定要刊印哪本书时，先将内容审订好，把封面、版式规划设计好，随即交印刷所排版印制。这些工作多是在夜晚突击完成，最后由王辛民亲自校阅后付印。

当书印刷装订好后，即先迅速分散存放，大部分是在晚上或刮风天（当时北方常刮大风，尘土迷天），秘密地分散开，一小部

分暂时掩藏在印刷所。分散掩藏书的地点有：一部分于夜间存放在保定师范几个教室的讲台下（木板讲台，内空，无人注意）；一部分散存在其它学校，如保定甲种工业学校、第二模范小学和京汉路员工子弟学校等；一部分则用被单包裹起来，伪装成要洗的脏衣被，用洋车拉到洗衣坊里（当时和西门外大街路北一家洗衣坊关系很好，常给掩存不少书籍），取书时也用被单包裹好，伪装是取回洗好的衣被似的。后来在北平时，也曾利用熟人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可靠的个人关系），在北师大、北大、北师大附小，以及绒线胡同小学等处分散存放过革命书刊。

发行工作，也是秘密进行的。一部分是由党的组织系统发行下去；一部分是交给各校门房和各书摊、书店代售，同他们交代时，都说是从外埠寄来的；大部分是打成邮包寄往外埠外地，其中主要是北平、上海和北方其它城市学校。和上海的邮寄关系，除用邮政信箱号码外，还有“东方青年社”（通讯处是暨南大学）；由保定寄往北平的书，有“北方青年社”（通讯处是清华大学；寄给北平党组织的，也寄给清华大学，代用名是“张清一”；王辛民对外联络常用王光潜名字）、“开拓社”（通讯处是北京大学）和“转换社”（即“麀尔读书会”，通讯处是北平师范大学）等处；寄往北方其它城市学校的有：正定地区寄河北第八师范，邢台地区寄河北第四师范，大名地区寄河北第七师范，泊镇区寄河北第九师范，等等。邮包都是趁傍晚天色黑暗时，由王辛民本人两臂分抱着步行（很少坐洋车）送到车站附近邮局投寄的。

由于白区工作绝对秘密的需要，不仅书刊封面上的地址常故意印上并非当地出版的地址，就是邮件来往也用了好多不同的化名，而且名字也是常常变更的。王辛民同志用固定的邮政信箱号码同上海联系，实际就是“华兴书局”，而这个书局正是党中央的出版发行机构。他们给王辛民寄书或纸型，信内下款常是写“你的朋友”，而王辛民和他们联系时，也都是用“王光潜”这个名字。王辛

民在北方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间曾经用过一些别的名字，如：“王辛垦”、“王逸民”、“王晨曦”、“王一民”、“李达科”、“王达科”等化名。

北方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绝大部分是重新校订和排印以前党的出版机构的优良出版物，另外也编审出版了部分新书。它的出版物，大致划分为两大类丛书：凡是内容比较通俗而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能够半公开发行的，则列称“人民文化丛书”或“大众文化丛书”；而凡属经典著作或带有指导性的纲领、党的决议案及文献之类，则列称为“左翼文化丛书”。当时，这些优良出版物或书稿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保定“群玉山房”及“世界图书馆”（均在保定西大街路南）经理苏馨甫（苏兰田）先生所保存下来的一批革命图书，由于熟识的缘故，以较便宜的价钱购得；二是北平党组织给搜集了一大批（当时中共北平市委唐锡朝〔唐冰，现名唐明照〕让清华大学同学张凤阁〔抗战时牺牲，烈士〕设法交给王的），三是上海方面党中央的出版发行机构——“华兴书局”以邮政信箱号码代表，陆续寄来一些新的出版物，后来还寄来了不少制作好的刊印纸型（白色恐怖极其严重后曾被保定反动当局检扣了一些）。北方人民出版社前后所刊印的出版物，即前面提到的所划分的两大类丛书，书名如：《土地农民问题指甫》（包括中共六大决议案和五次劳动大会决议案等）、《苏维埃宪法浅说》（附录：“一苏”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当时中央刚通过后，即由北平市委唐冰寄到打印稿）、《武装暴动》（封面伪印成《艺术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包括《共产党宣言》及《雇佣劳动与资本》）、《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选辑《红旗周报》论著，封面伪印成《孙文主义之理论与实际》）、《资本主义之解剖》（即《共产主义A、B、C》）、《国际政治法典》（即《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新订本）、《中国革命论》（即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决议案）、《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国际代表在中共六大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共产国际纲领》、《国

家与革命》（列宁）、《论反对派》（斯大林）和后来在北平出版的《苏联革命过程中底农业问题》（列宁）等等共二三十种。

本来，北方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按原定计划暂拟刊行五六十种，约在一两年内可全部出版。但是，就在1932年7月，保定发生了反动当局镇压保定师范学潮的大惨案，军警包围，屠杀逮捕大批革命学生，大肆制造白色恐怖，王辛民也被通缉，从此北方人民出版社保定社务被迫暂告结束。

反动当局镇压保定师范学潮，和北方人民出版社有何联系？原来王辛民同志就是在保定师范上学时入党和工作的，北方人民出版社的办公地点，就设在保定师范院内东南角上，即紧靠护城河的一排十间所谓“养病室”最南边的一间房子里（隔壁一间便是中共保属特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贾良图的办公室）。王辛民同志被通缉后，才转移到北平，在北平又设法出版了后期出版物如《苏联革命过程中底农业问题》等，而收回了一笔现款，始得偿还了拖欠“协生印书局”的印费。

北方人民出版社从建立到全部结束，前后共一两年时间，但是，显而易见，它是肩负起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的，为满足广大革命人民对精神食粮的需要，为扩大党在北方的影响，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革命力量，作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

当年的北方人民出版社，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保定协生印书局的经理张培植和编审赵云韬，冒着极大危险，慨然承印出版社的出版物，而且一直合作得很好。共同的革命事业，加深了同志间的了解、感情和信赖，张培植曾把一本内部油印的《三民主义批判》小册子，交给了王辛民保存，而王一直保存至今（中华书局1959年11月出版的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书影15页有该书封面书影）。但是，仅仅在此后数年的1939年，张培植因支持抗日战争，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运送印刷机器器材等时，中途被保定日本宪兵队发现而逮捕杀害了。再就是保

定师范门房老收发员韩福（字桂亭，河北定兴县人），是他，把每一化名收件悉心交给王辛民同志，而反动当局几次追问他“这些人是谁？”都被韩福很机巧地加以拒绝，坚称“本校并无此等人”，而掩护过去了。